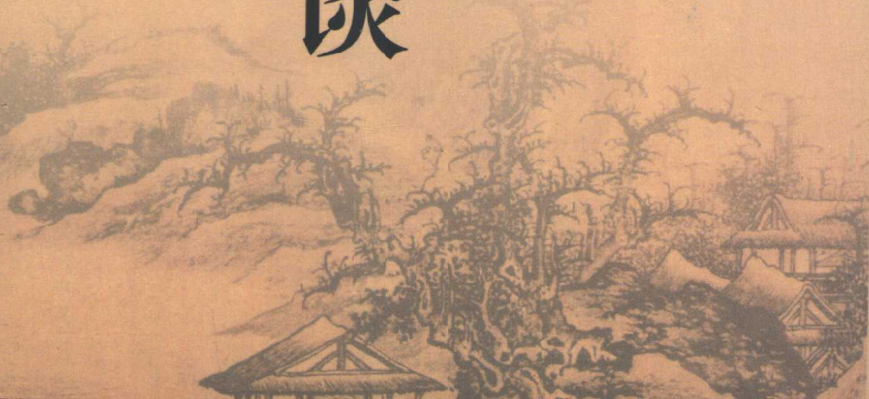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古籍整理出版漫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
《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册》

古籍整理出版漫谈

· 1 ·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古籍整理出版漫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整理出版漫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8
ISBN7—5325—3804—4

I. 古... II. 全... III. ①古籍整理—中国—文集②古籍—
出版发行—中国—文集 IV. ①G256.1—53②G237.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4249 号

古籍整理出版漫谈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古籍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 插页 4 字数 127,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00

ISBN 7—5325—3804—4

Z·367 定价: 1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T: 64063949

前言

2003年10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举办了第三期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这一期的授课内容主要是从出版理论和古籍整理实际状况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给广大古籍社编辑,尤其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编辑以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和指点。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古籍整理事业任重而道远。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在曲折中缓慢地发展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20多年来,中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在这一方向的指引下,加快了整理和出版的步伐,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杨牧之《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回顾与展望》,见本书第一讲),由此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成绩喜人。为了全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50多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成就,2003年9月,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办,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图书馆、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承办了建国以来的首次“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展”。这次展出,既是对建国以来我国古

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一次全面检阅,又摸清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现状,为我国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指明了方向。但是,截止到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才1万多种,仅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十分之一,所以,更多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还有待将来。

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是关键。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也着重强调了古籍整理出版队伍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急迫性、必要性。本着培养古籍整理专业人才的目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2001、2002、2003年连续举办了三期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聘请全国各地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专家授课,在古籍整理出版业务方面给予学员们以专业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和指点。从目前来看,这一举措得到了良好的反响。今后,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把举办培训班作为一种制度,每年举办一次,争取为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行业培养尽可能多的人才。前两期培训班专家的讲稿编为《古籍整理出版十讲》、《古籍编辑工作漫谈》,已分别交由岳麓书社和齐鲁书社出版,第三期培训班专家的讲稿编为《古籍整理出版漫谈》(按授课先后排序;辛广伟先生在培训班上作了《古籍出版中的法律问题》一课的讲授,但由于现行出版法正在修订,所以此次出版未将其讲义收入),交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作为全国古籍社编辑培训班系列讲座的出版物,希望能对未参加培训班的全国古籍编辑业务水平的提高有所裨益。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4年1月



杨牧之

杨牧之,196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毕业。随后进入中华书局从事编辑工作。1987年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从事出版管理工作,曾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中国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目 录

前 言	(1)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杨牧之 (1)
古籍图书的结构调整与市场扩容	李 岩 (21)
普及读物图书的宣传推广	孙顺林 (27)
现代信息技术在古籍整理出版中的应用	尹小林 (33)
辞书出版的现状及其质量保障体系	李伟国 (51)
古籍整理与汉学研究	柴剑虹 (67)
新印古籍的发行工作	吴凤祥 (83)
坚持专业特色与地方文化相结合	
——漫谈古籍整理中地方学人全集的编纂与出版	姜小青 (101)
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典籍的整理与出版	楼宇烈 (111)
科技文献整理出版摭谈	林文照 (137)

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杨牧之

中国的传世古籍浩如烟海，“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余嘉锡先生语），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中国的古籍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从孔子删诗、刘向校书，到清人编写《全唐诗》、《全唐文》、《四库全书》，大规模的古籍整理持续不断，影响深远。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近代中国的出版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近代著名出版机构，曾出版了《百衲本二十四史》、《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丛书集成》等大型古籍丛书，在近代出版史上形成了一个古籍整理出版的热潮。

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事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巨大的支持。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老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指示和关怀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出版，成为新中国文化事业中前所未有的—件盛事。1981 年 9 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古籍整理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明确的目

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在加强对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规划和领导的同时,也加大了对重大工程、重点选题的资金支持,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斐然,呈现出勃勃生机。

一、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曲折前行

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整个新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占有重要的位置,这项工作看起来似乎与现实联系不紧,但是它的兴衰起伏却与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紧密相关,可以说是整个新中国出版事业的一个缩影。总体而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走过了一条曲折前行的道路。

全国解放之初,北京、上海的一些地方的出版社延续解放前的业务,有少量古籍图书出版。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并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古代小说名著的整理。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水浒》(七十回本)校注本出版。接着,《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儒林外史》、《水浒全传》等古典名著新整理本陆续问世,这是新中国国家出版社最早整理出版的一批古典文学名著。1952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庆贺〈水浒〉的重新出版》的短评,标志着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起步。

1954年以后,文学古籍刊行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相继成立,专门从事古籍整理和传统文化普及读物的出版工作。随着出版社的组建和调整,古籍出版的范围由文学逐渐扩展到历史、哲学等其它学科。1956年,第一本经过精心整理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次年《续资治通鉴》也与读者见面。《资治通鉴》整理小组集中了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史学家,诸如顾颉刚、齐思和、张政烺、郑天挺、邓广铭、周一良,复校的有聂崇岐、王崇武、容肇祖,大家协同

作业,其质量之高,速度之快,堪称一时之盛。另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百衲本二十四史》、《宋会要辑稿》、《古本戏曲丛刊》(初、二、三集)等大型古籍相继影印出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又重印了一批建国以前的整理本如《国学基本丛书》、《诸子集成》、《二十五史补编》等书,满足了一部分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

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计划性,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任组长,主持制定了《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全面的安排和统一的部署,计划性、目的性大大增强。此后,《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散曲》、《文苑英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等大型古籍大规模出版,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出版工作,被后人誉为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

1959年,由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史记》,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它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古籍整理出版工作陷入停顿状态,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也全面停止。1971年,经毛主席、周总理特别关怀批准,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得到恢复,并从全国高校和研究机构调集一大批专家、学者,集中到中华书局,继续进行这项宏大的古籍整理工程。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基本结束。1977年底,《清史稿》出版。1978年春,最

后一种——上海方面承担的《宋史》出版。至此，历经二十年，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和出版工作者协作完成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新整理本全部出齐。这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整理成果，赢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从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本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界普遍使用的最好版本。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出现了新的转机。1981年，陈云同志先后两次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古书如果不加标点整理，很难读，如果老一代不在了，后代人根本看不懂，损失很大。”又说：“搞这个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这件事一定要搞到底。”

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极大地调动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在李一氓同志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同年9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副组长周林同志担任主任，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此后，全国部分省份及农业部、卫生部和国家民委陆续组建古籍整理规划机构，各省市地方古籍出版社陆续成立，部分高校也相继建立了一

批古籍整理研究机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组织规划、人才培养和出版等方面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199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调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的通知》,新一届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匡亚明同志任组长。同年5月,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为大会题词:“整理出版古籍,继承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会议审议制定了《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针对当前形势和需要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作了适当调整。

1999年5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和临时机构设置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文件精神,新闻出版署党组决定组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负责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先后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于友先、石宗源同志担任,原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和顾问改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和顾问。2000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制订“十五”期间(2001—2005)国家古籍整理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通知》,并邀请部分小组成员和各学科专家组成了规划项目审议委员会,起草了“十五”规划草案。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改组后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从当前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出发,强调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可行性,将规划项目的督促和落实作为工作的重点,加大了对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项目的

资助力度,规划和资助项目的完成率大大提高。规划领导小组还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专门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出版规范化,以及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等多个方面,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使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领导与古籍整理工作的实际得到了更紧密的结合,充分发挥了它的有效管理和宏观调控作用。

回顾过去五十多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曲折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稳定繁荣,是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兴盛的基础。建立和健全一支专业的古籍整理出版队伍,是做好这项工作的保证,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中所说:“整理古籍,需要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1981年中央指示发布以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至今,正是因为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历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上所做的大量实际工作,和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使这项事关中华文化传统承继不断的伟大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二、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斐然

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从无到有,并逐渐形成目前这样全面规划、稳步发展的新局面,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发布,强调指出了整理古籍的重要性、长期性及其深远影响,确定了古籍整理的重点和目标,指明了领导班子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紧迫性、必要性。国家在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仍决定每年划拨古籍整理出版和人才培养的专项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发展。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新版古籍图书的品种、数量和学术水准,还是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建

设,乃至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都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就。可以说,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下发、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以来的二十多年,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飞速发展的一个崭新的阶段。

首先,新版古籍出版数量大幅度提升,并渐趋适度、稳定的态势。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其中的丛书如《丛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只作一种计),是此前32年古籍图书出版总量的1.9倍。最近几年,古籍图书的出版受到市场因素的制约,新版古籍的数量有所减少,但每年仍保持500种左右。粗略统计,截止2002年,新中国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总计已逾1万种,是现存传世古籍总量的近十分之一。近20年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占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物总量的80%,这个比例直接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古籍整理出版所取得的成绩。

其次,新版古籍的学术质量提高,体现一代学术水平的成果集中出版。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都拨出专项经费用以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再加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宏观调控作用,使得古籍出版的计划性、规范化和古籍整理图书的学术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大批重要古籍、重大项目得以整理出版,众多出土文献得以及时汇集问世。例如,继二十四史、《清史稿》、《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之后,《清实录》、历代纪事本末、历代会要会典、《历代史料笔记丛刊》等的整理出版,为新中国的古代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相对完备的基础。又如,《诗经》、《楚辞》、《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两汉全书》、《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诗》、《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全辽文》、《金文最》、《全金元词》、《元诗选》、《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词》、《全明文》、《六十种

曲》、《全清词》、《清文海》等断代诗词文曲总集的编纂或出版,表明自先秦至清的历代文学作品均可大致搜罗完备,不但可以把某一代的文学作品汇集于一书,从而窥见一代的文化风貌,而且也便于全面研究。再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任继愈主编),全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堪称古籍整理的大制作;《甲骨文合集》(郭沫若主编),是殷墟发现甲骨以来真正集海内外收集之大成的合集,标志着我国上古史和古文字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十三经注疏》(全新整理本),表明目前对中华文化的基本资料库“十三经”的整理与研究已远远超过了清代阮刻旧本;《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的中国古籍整理和翻译的巨大文化工程,也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工程。至于抢救性质的重大项目,如《永乐大典》、《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等书的搜集和出版,属于总结一代文献性质的新编总集或资料汇编如《敦煌文献合集》、《中华律令集成》、《中国兵书集成》、《古本小说集成》、《吐鲁番出土文书》、《清人别集总目》等,也都是古籍整理史上前无古人的新成果。

第三,古籍整理出版总体布局进一步扩大,古籍整理选题范围拓宽。除了人们原先关注较多的传统概念中的文史古籍外,科技类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得到高度重视。1982年,卫生部中医司成立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在全国划分了10个协作片组织规划的落实。中医古籍整理的重大成果如《诸病源候论校释》、《黄帝内经太素校释》等,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农学方面如《中国农学珍本丛刊》、《中国农业遗产选集》及《齐民要术校释》等,也是颇具学术价值的上佳之作。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出版体现着国家的民族政策,在国家民委的统一规划下,已整理出

版少数民族古籍 3000 余种,其中《格萨尔王传》、《布洛陀经诗译注》、《福乐智慧》等,民族特色浓厚,版本珍贵,富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培养成绩显著。党和国家对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十分重视,1959 年 3 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通过高教部委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开设古典文献专业。同年 9 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开始招生。这是新中国系统培养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开端。1982 年 7 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要求每年向教育部划拨专款,用于文史哲古籍人才的培养。到目前为止,全国高校所设古典文献专业已增至四个,另外还有八十多所高校建立了古籍研究所,在完成古籍整理课题的同时,还培养了大量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央和地方的各级社科院、图书馆,有的也建有相应的古籍研究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了老中青的合理梯队,加上不断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本科生、研究生队伍,可以说目前古籍整理专门人才的储备,在数量上已达到数千人的规模。

第五,古籍出版力量进一步壮大和充实。1958 年,中华书局被指定为专业古籍出版社(包括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蓬勃兴起,虽然后来有所并转,但现在全国古籍出版社联合会的成员已达 22 家之多。这 22 家古籍社的编辑人员接近 600 人,年平均出书品种在 2000 种左右(其中 6—7% 成为重版书)。如果再加上部分承担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中央和地方综合出版社、高校出版社,那么目前古籍整理出版总体能力比起 20 年前要翻好几番,已成为全国出版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全国范围古籍整理出版的规划和协调,逐渐显现出主